八十一年的历史回响 新时代的浪漫之歌

□欧阳逸冰

1942年的春天，重庆国泰剧院的舞台上，屈原发出了震撼心灵、震撼人间的吼声：“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八十一年后的又一个春天，在中央歌剧院剧场的舞台上，屈原又发出了震撼心灵、震撼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新时刻的吼声：“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的新作话剧《屈原》（编剧黄维若，导演郭小男，舞美设计黄楷夫）与八十一年前郭沫若的杰作《屈原》遥相呼应，续写着话剧史上壮阔的波澜，回荡着近百年来奔腾涌跃的爱国主义吼声。

屈原文化——精神家园与创作土壤

雨果曾这样赞美古希腊文学的开创者荷马：“世界诞生，荷马高歌。他是迎来这曙光的鸟。”同样，对中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鲁迅的赞美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郭沫若的褒扬是：“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换个说法就是“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八十一年前，中国话剧把伟大的屈原文化，这个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之一，在舞台上做了生动感人的戏剧化表达。切莫说那部《屈原》仅仅是反专制、反腐败、反分裂的政治化表现，君不见，该剧公演前三个月，在全民抗战的伟大历史画卷中，竟然出现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罪恶，数以千计的新四军英勇战士，竟然遭污名，遭围剿，遭枪杀，遭囚禁，与屈原含冤悲愤之情何其相似：“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那首贯穿全剧始终的《橘颂》既是主人公的化身，也正是含冤遭害的新四军战士们的象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当然，这是政治，是当时抗战的中国人共同的呼声。然而，这也恰恰显示着屈原文化永具的伟力。郭沫若为什么用屈原的诗歌、思想去表达时代的声音呢？因为屈原的诗歌和思想是中国人的精神之源、民族之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正像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一样，屈子之诗更是万代光焰。长江人艺的新编历史剧《屈原》同样如是，不仅仅说的是楚怀王的昏庸、张仪的无耻、南后的妒毒、子兰的卑劣、靳尚的阴险……更让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屈原在残酷的现实中进行的长久的痛苦的思辨。在沉江之前，他那犹如瀑布自万仞山直泄而落的一连三十一个“为什么”的独白，显示着自己从忧思中突破出来的艰难过程。他“不屈服”的最终决定是，和楚国的江河大地永远在一起！彼时彼刻，他已经不是什么三闾大夫，而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朵冲天的浪花，是历史天空中一颗灿烂的星斗。他的诗歌中闪烁着中国人思想的锐利、智慧的绚丽、想象的多彩、情感的高尚、见识的广博、文明的悠远……八十一年话剧历史的回响显示着屈原文化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屈原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又成了我们后人艺术创作的土壤。或许这是中国话剧对自身的艺术发展、对现当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建设的重要贡献。

艺术辩证法的胜利

“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这是我们对那些写出了令人惊奇的作品的作家赞美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对该剧的主创同样适用。所谓“揭示它的奥秘”，就是对“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个谜”的精彩解读。

屈原在我们心中是多么圣洁，多么美好。剧中，化用屈原诗句，主人公自谓“清晨，我吮吸着木兰花上的坠露，傍晚，我餐食着菊花瓣上的蓓蕾。我驾着八匹龙马，在云彩之上飞奔，迎着朝阳的东升……”这是何等的清高，何等的浪漫！然而，在舞台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这位脚踏淖泥的主人公：

正在楚怀王沉溺于蛮女美色的荒淫时刻，曾先后贵为左徒、三闾大夫的主人公却仿佛视而不见，一再谦卑地向大王呈上革新的方案：“草拟法令的要点，臣下已备好，明修法度共五章……”以至于惨遭楚怀王的厌恶，犹如推开令人腻烦的犬马。屈原竟至于如此聒然于朝堂之上？明知楚怀王昏庸得早已不可救药，他却要一再直谏，以至于楚怀王叱骂他“就像个巫祝念咒一样，弄得寡人头也痛，心也跳”。遭到拒谏的他，竟然横身拦阻楚怀王的銮驾，惹得楚怀王要将他砍头、刖足，他却坦然回复：“大王……把我的心拿出来，它一定是鲜红的，大王一定能体察屈原内心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正如楚怀王惊叹的：“你的脑袋都要没了，还在作诗！”他不是作诗，而是死谏，是用整个生命在血荐轩辕，他的诗就是用生命写就的！

或许更令我们心疼的是另一个场面：屈原竟跪拜在“毒妇”郑袖面前，乞求她代为说服昏庸的楚怀王同意出兵巴蜀，以防秦保楚。此状被内心阴暗的郑袖鄙薄为“枕头风”……他这又是何等的天真，何等的尴尬。

这就是个性之谜。屈原的品德才学，令人仰之弥高，却会陷在这样的淖泥中挣扎、拼命，那是因为他不解朝廷龌龊的“人情”，他不计自己的名利，他不变对国家的忠诚，他不谙官场的“潜规”，他不会迎合君王的好恶，永不忘自己美好的理想……所以他才如此地失败、尴尬、愚拙。然而越是如此，他才愈令我们景仰。他不是万全的“圣人”，而是万代的人杰。他为了真理而“上下求索”，“哀民生之多艰”，为实现“美政”的理想，为了让“陟陞皇”（东方升起的太阳）永远照耀着自己的“旧乡”，他才如此艰难地、尴尬地挣扎着、奋斗着。剧作让观众窥到了主人公内心的全部“奥秘”，那就是对家国爱得真挚、爱得专一、爱得纯净、爱得沸腾，爱得那样不顾一切。

这样的对比、对立，正是艺术辩证法的胜利。

这种艺术辩证法的胜利还表现在主人公屈原与重要人物楚怀王（熊槐）两个人物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戏剧性关系。

剧中的楚怀王塑造得非常有特色。舞台上的昏君形象并不少见，但是此昏君非彼昏君，他是一个顽痞，玩中见顽，顽中见痞。到了最后，他被张仪骗去出席“会盟”，进了秦国的监狱，他依然用“玩”的方式来拒绝胁迫，表达出作为楚君的最后一点儿“骨气”。这个人物的深刻性就在于，在他隐秘的内心底层，存有一个昏君的“逻辑”。譬如，张仪用“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来欺诈，他为什么会立即上钩？楚怀王跟屈原说了心里话：那原本就是楚国的疆土，他的父王之所以取名为“熊商”，就是矢志于收回商於之地六百里。在这个上当的“逻辑”里，我们不正是看到了人物内心的隐秘——头脑昏庸和心系江山的“二极性的对立统一”吗？

剧中，主人公和楚怀王这一对人物的戏剧性关系充满了这种“二极性的对立统一”。请看——

楚怀王上场的第二句台词就是“我是你最恨的人，也是你最爱的人啊”。这句谐谑的话正是夫子自道：在这个世界上，他最讨厌的就是屈原，因为屈原坚决反对他沉溺于荒淫嬉戏，玩忽国事。然而他所有的心里话都向屈原坦白，因为他知道满朝大员之中，只有屈原心底最干净。于是，有意味的人物关系建立起来了。屈原与楚怀王这一对性格迥异、内心活动完全相反的人物形象，建立起了一正一反又正反相通的戏剧性关系。全剧中他俩都是对立的：革新与反革新，出兵巴蜀与不作为，是否“绝齐”，信与不信张仪，以及“不能去武关会盟，那是陷阱”与“偏要去武关会盟”，跳进陷阱。令观众看不胜看的正是他俩的正反相通。主人公一再阻拦楚怀王的昏庸决断时，甚至忍不住痛骂他“愚蠢”。而当楚怀王向主人公倾吐真情之后，主人公又动情地说：“我不想让你死。”人物内心最隐秘的变化令人体味不尽。而楚怀王赴武关会盟是为了赢得时间，托付屈原迎回在齐国当人质的太子熊横，并辅佐其继承王位，以阻挡子兰为代表的卖国集团把持大权……如此关乎国运的重大使命托付给主人公，那又是何等地信任。

这样的两个“死对头”，又蕴含着多少主观之外的历史客观样态？

这才是塑造人物形象、建立戏剧性人物关系的核心元素：“二极性的对立统一”。或者说，这才是戏剧艺术之“三昧”矣。

这样的人物关系，决定了该剧不同于郭沫若《屈原》的崭新架构。全剧从屈原将要殉国的公元前277年开始说起，他在梦中或者朦胧中见到了已经死去或还没有死去的人，主要是死去了的楚怀王、死去了的张仪。这样一个结构看上去是倒叙，其实不是一般的倒叙，而是在人物关系的冲突中一环一环地推下去，展开了纷纭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主人公与楚怀王的人物关系先是讨厌，之后是对立，再后是生死不容……到了最困难最尖锐最白热化的时候，面对楚国的危在旦夕，他俩突然间站在了一条线上。这种人物关系、这样浪漫主义的架构大大地不同于郭沫若浪漫主义的《屈原》，将全剧内容压缩到一天之内。这里无所谓“高低”，重要的是新编历史剧《屈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这是后来者肩负的历史责任——我们循着前人的方向，开拓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

“天问”决定了全剧的品格

如果说，“雷电颂”是郭沫若的《屈原》留给中国话剧不朽的独白，那么，新编历史剧《屈原》结尾，从《天问》中衍化出来的“问天”三十一问，正就是该剧的华彩乐章。何止华彩，其中更有深厚的思想含蕴，犹如舞美设计（含灯光、多媒体设计等）在天幕展示的浩瀚的银河、无边的星空以及闪烁星光的背景，那是可以任意幻想的未知的宇宙之炁（元气）……

主人公这段大约六分多钟的独白，一共提出了三十一个“为什么”。以《天问》原文“遂古之初”等四句，打开了自己郁结的心灵，仿佛是剖开自己的心扉，仰身而独臂支撑，而另一只手臂指天而对，仿佛所有的星斗尽数麇集在他的胸襟。“月亮……哭泣……太阳不再升起……”说到“东皇太一叹息”时，他已不忍正视而背向。想到“湘君……痛惜”，他竟反转向后，倒看世界……接下两个“为什么”之后，节奏急切，变感叹为愤怒，变愤怒为怒斥，在泥沼中连续翻滚之后，发出“为什么你品行高洁，就会永远地孤独沉寂”的质问。稍顿之后，如飞鸣镝一般，越快越高越强地发出十二个“为什么”，直至爆发出我“为什么总是在痛苦的旋涡中窒息”时，演员王洛勇情之所至，如戏曲“倒僵尸”般地倒在淖泥之中，继续喃喃低语着“为什么”……忽然，传来清脆的滴水之音，犹如清灵入心，他幻想着真正的波涛奔涌而来，竟一跃而起，一头扑向山泉之崖，现出单腿朝天，手臂与头颅探寻那生命之水、那清澈世界的本源……他突然心灵充满阳光，“为什么我不学先贤彭咸（殷商大夫，直谏被纣王拒绝，投江而亡）呢？”他做出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高洁的决定：一连三个“我来了”，投身于“清澈”的世界，投身于“湘君湘夫人”的神话世界，投身于“大楚的江河大地”，他永远化身于自己的旧乡故国了。

这一段的戏剧表演，观众看到的不是“朗诵”“造型”，而是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美。主人公在剧中历经了为祖国、为理想而不懈地奋斗再奋斗和对黑暗的反抗、再反抗，最后这段“问天”，显示出的不是恐惧、恐怖，而是对黑暗、对不公正的命运的决绝反抗。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

由此，全剧的品格立即飞升了，进入庄严灿烂的悲剧崇高美。

相隔八十一年的两部话剧《屈原》，它们的主调是一致的，都在弘扬屈原和屈原文化，开拓并壮阔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之源。尽管新编历史剧《屈原》尚有可以再精炼之处，但它是对1942年的话剧《屈原》的历史回响，是新时代的浪漫之歌，是话剧艺术的可贵收获。

守正创新 开掘历史精神

□刘 平

话剧《屈原》是一部体现守正创新意识、具有开掘历史精神的优秀作品。

该剧的成功首先在于创作理念的创新。与1942年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不同，黄维若的《屈原》把激烈的政治激情转化为细腻的人物形象刻画，通过人物内心情感的开掘凸显人物的家国情怀，弘扬民族大义精神，从而显示出一种艺术的张力和魅力。

其次是人物形象塑造的突破与创新。剧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内心情感的深入开掘，塑造出全新的屈原、楚怀王、张仪、陈轸等人物形象。剧作以屈原的“回忆”为情节发展脉络，追溯历史、刻画人物，通过屈原与他心中人物的“心灵对话”，解读人物情感，使该剧产生了强烈的情感震撼。为展现屈原的正直与坚守，塑造他敢于坚持正义，为国家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的崇高形象，剧作巧妙地安排了屈原与两组人物的矛盾：一是与楚怀王、张仪的矛盾冲突，一是与陈轸的心灵碰撞。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心里通透、人品高洁、敢于直言的人。他时刻关心国计民生，在百般磨难中，也不想用某些政客的阴谋伎俩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使楚国国富民强，屈原向楚怀王力陈变法的益处，可楚怀王只顾自己玩乐，还以吴起的悲剧警告屈原。屈原却丝毫不顾自身的安危，为了楚国的利益，他即使“面对死亡，也决不后悔当初的志向”。张仪一心想扳倒屈原，搞垮楚国。为此他不惜重金贿赂以靳尚、上官大夫为代表的楚国利益集团，鼓动楚国与齐国断交、与秦国联盟，并以归还商於六百里土地为诱饵，引诱楚怀王“上钩”。屈原识破张仪的阴谋，极力阻拦，反而被楚怀王放逐。但他并没有退缩，“一心追求自己所做的一切，即使九死也不会后悔”。屈原与楚怀王和张仪的斗争，充分显示出政治斗争的复杂与残酷，从政治理想的层面刻画了屈原的刚强与坚韧的毅力。而楚怀王的“昏”与“醒”，也彰显了一个君王的复杂心态。

楚国被张仪所骗，楚怀王后悔莫及，于是又召回了屈原。对秦国邀请楚怀王去武关会盟一事，屈原、昭睢等人极力劝阻，楚怀王对屈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楚国一蹶不振，江河日下”，如果“寡人不去武关会盟，他们的军队就会猛攻过来”，为此“寡人必须去武关。一是要赎回这些年寡人误国之罪……二是要暂解楚之危局，使得你们有时间能好好重整大楚，再次图强”。楚怀王的一席肺腑之言令屈原感动，也让观众对楚怀王刮目相看。

屈原与陈轸的对话，则是对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政治旋涡中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诘问，由此显示出屈原的人格力量与精神诉求，从心灵层面和情感方面揭示他的理想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他无私奉献的纯洁心灵与高尚精神。

当屈原遭到诬陷被放逐之时，陈轸感到愤愤不平。他敬佩屈原的人品，劝他道：“先生的见地，先生的学识，先生的文采，广博深邃，自成一派，不输于他们任何一家。而所有的学说与道法都是没有国界的……先生何必囿于楚国一地，拘泥于家国之见？”而屈原却说：“可是发明学术、建此道统、推其思想的人，却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故土。”掷地有声的话语不仅让陈轸感动，也震颤着观众的心灵。

导演、演员的倾情创作，使该剧的舞台呈现出一种诗意化风格和流动的浪漫意蕴。舞美、灯光、音响等手段，烘托出楚文化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王洛勇饰屈原时的激情表演，充分展现了屈原心底无私的纯洁、真诚的人格以及他为了楚国而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的崇高精神；郝平的表演把楚怀王的人格和国君的抱负展现得淋漓尽致；庞磊（饰张仪）的戏不多，却把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形象鲜明；彭刚（饰陈轸）的戏很有意味，启人深思；此外，饰演郑袖、靳尚、上官大夫等人物的演员，也展现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

该剧最具震撼力量的戏是结尾部分屈原发出的“天问”。就在屈原万分绝望准备到江河里去寻找“最干净的地方”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了手执吴戈、身披犀甲的楚国士兵，他们在激昂悲壮的音乐烘托下，雄壮威武地向屈原走来。“我们来陪伴你。你要去的地方，是你的理想；你要走的路，是坚持信仰的道路。是你告诉我们，人可以死，而信念与必胜之心永远不灭！”他们顽强的抗争意志也深深地感染了屈原，“好啊！我们是永远的战士，我们是永远的勇敢。我们虽然战死，但我们永远不会屈服！”慷慨悲壮之势把全剧推向了高潮。

一场逆旅 一脉清流

□李 达

由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湖北三峡演艺集团创排的话剧《屈原》，在《橘颂》《九歌》《天问》等诗歌片段的吟咏中，徐徐展开了一幅意境高远的中国画卷，带领观众走近屈原浪漫的文学世界和高洁的精神殿堂。

一、思想的形象和形象的思想。屈原的形象在各时代都展现出鲜明的特色，忠君的、孤愤的、失意的、抗争的，不一而足。真实的屈原究竟是何模样？黄维若版的话剧《屈原》给出了他的回答。编剧从屈原的诗歌入手，从其中表现出的人物的精神世界、人格品质及性格方式入手，将历史人物转化为当代艺术形象，融入了现代人对历史人物的思考、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从屈原“诗言志”的精神维度、“忠于信”的理想维度、“践于行”的性格维度，结构戏剧、确立风格、选择形象、组织事件、淬炼语言，把流淌在屈原诗歌中的思想具化成舞台形象，又通过舞台形象的戏剧动作、心理活动、人物对白进一步加深观众对他思想的认知，从而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立象以尽意，造象以传意，观象以求意。”编剧造屈原之象，传其诗文之意、思想之境是旨归。为此，编剧给了屈原之思想以“水流”之意象的“通感”。开场潺潺的流水声仿若屈原意识之流，从其生平最后的困境中发端，从他被流放的人生末途启航，沿汨罗江水逆流而上，直抵他政治主张不断碰壁的现场。编剧找寻激流中嶙峋的礁石与漩涡，打捞出楚怀王、郑袖、张仪等诸多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在其笔下幻化成沧浪之水在剧场中拍岸而来，屈原之象也随着屈原的独白、对子戏、多人戏呈现出愈发清晰的形貌。无场次的戏剧结构使该剧具有了如屈原诗歌般自由瑰丽的审美风格，在表达上突破了以时空顺序来组接事件的旧式格局，呈现出放射性、情绪性的心理结构特点，屈原的回忆、联想、闪念、幻觉等逾越时空、切进切出、无边无际，又始终流淌在编剧既定的河道内，归向屈原精神世界的终点。

二、物境、情境、意境中的诗化空间。王昌龄的《诗格》中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用于品鉴该剧，亦为恰当。

“物境”是观众沉浸该剧的视觉基础。剧中生发于屈原诗词中的精灵鬼怪乃至楚王之灵魂，其衣着装扮或“被薜荔兮带女萝”，或“华采衣兮若英”，弥漫着香草美人之诗情诗趣，人物服饰衣着紧扣战国的时代背景，再现了楚地的人文风貌。舞美方面，LED屏与简单的桌椅构成虚实相生的叙事场域，通过布满天幕的橘树、璀璨的星河、深邃的宇宙，将《橘颂》《天问》等诗歌意境延至诗外，在舞台上营造了浪漫主义的诗化空间；同时，LED屏呈现的暗色调下宫殿局部的飞檐穹顶不仅构筑了剧本的事件环境，也暗示着屈原所面对的昏暗复杂的政治环境。

“情境”即抒写喜怒仇怨之情绪。编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话剧语言艺术的抒情性与诗歌“感时伤事，别有深情，非可言喻”的构筑心理图景的巨大作用，为屈原设计了大量或文或白的台词。对屈原诗歌原文的吟咏引导观众置身历史情境，白话文的诗句结合演员的舞台动作则迅速放大了历史与现实、舞台与观众的情感合鸣，不仅使得人物的内心历历如绘，又增加了该剧诗的韵味。

“意境”意为叙写心意思想。该剧在以事件为核心的叙事段落中，以多组矛盾表现屈原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思想之思辨和精神之风骨：向楚怀王、郑袖“不合时宜”地主张变法，凸显着他的孤直；在两次朝议的殿堂上，他被众人围攻诋毁，映衬着他的孤立；以死劝谏，体现着他的孤勇。而在个人独白的抒情段落中，屈原一身洁白的楚服，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微光烛照出他的孤洁，喷薄而出的诗句或直抒胸臆，或“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意溢于言外”，深沉的“情”和新颖的“理”水乳交融，构成富有启悟力和感染力的思想镜像，使屈原的形象得以穿越时空，走进现代观众的心中。

三、历史剧的时代品格。历史剧在题材选择和创作方法上有其独特特征。如何使历史剧在拥有历史主义精神的同时具有时代品格并对当代生活有所启示，体现着编剧与创作团队的巧思。该剧植根屈原诗歌和《史记》的真实土壤，编剧明白，一度创作既需要在历史的罅隙中通过创造性的虚构完成人物的弧光，而这种虚构又应该在“实然”的基础上放飞想象。因此，编剧以长年创作经验的积累和扎实的案头工作，从历史真实中开掘人物性格，又以立得住的人物性格推进戏剧行动，互为表里、回环反复，极好地处理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在“真”与“幻”间，最终让屈原这个戏剧形象振荡放大、不断丰满，成为了戏剧艺术长廊里独特的“那一个”。

该剧在立意方面没有空发“思古之幽情”，更没有以宫闱秘闻、厚黑权谋博观众眼球，而是投射时代、观照现实，关注人、关怀人、表现人，以诗心表诗意、以诗境传诗情，在家国、生死、取舍、进退等超越时代、国家、文化的人性命题中给人启迪，在文本缘起的“古”和现实达意的“今”中自由穿梭，找到了历史剧创作“隐蔽的机关”。剧作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提炼出了上下求索的奋斗精神、爱国爱民的质朴情感、坚守理想信仰的高尚品格以及变法图强、敢于斗争的创新精神，弘扬了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屈原这一形象在诗境中焕发出崭新的艺术生命力。